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这是新时代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部署。

天津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支点城市,承担着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的重要职责。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制度型开放不仅是天津融入国家战略体系的制度路径,也是锻造核心竞争优势、提升城市治理效能的关键支撑。深入阐释天津制度型开放的文化根基、实践逻辑、制度体系和治理转化路径,对于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制度集成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制度型开放的精神根基:文化结构与制度理念的双重演化

制度型开放的推进,依赖于深层文化结构的价值导向和行为规范。天津“襟河枕海、畿辅门户”的地理格局不仅塑造了城市的交通区位与经济角色,也孕育出“融通、宽和、进取、守正”的文化精神,为制度型开放提供了独特的精神土壤。从文化类型学视角看,天津兼具“多元文化交融特征”与“制度多样性演化路径”的双重特征。河海交汇的生态结构孕育出天津开放包容的文化基因,燕赵之慷慨与江淮之灵秀在此融合,南北文化、东西文明的叠加互动,不仅推动了文化混合,也形成了规则认知的多重共存机制。历史上天津在传统宗法制与西方法治体系之间形成了文化张力,也催生了较强的制度弹性和制度学习能力。

天津将“融通性”文化特质转化为制度吸纳力,将“进取性”城市气质转化为制度突破力,将“守正性”文化认同转化为制度稳定性,这构成了天津制度型开放的文化哲学基础。例如,“智慧零碳”码头不仅是港口技术升级的标志,更是制度适应性标准整合力的体现。其在绿色理念、智能化运营与国

际标准三者之间的平衡协调,显示出天津在文化软实力转化为制度硬实力方面的独特优势。

二、制度型开放的功能机制:从治理实验到制度供给

制度型开放强调在规制、规则、管理与标准四大领域的深层次制度变革。在天津的发展实践中,这一变革逻辑主要通过自贸试验区、“鲁班工坊”、京津冀协同平台等关键制度载体得以展现,体现为“功能平台—制度创新—政策传播”的系统路径。

首先,自贸试验区作为国家制度型开放的“试验田”,承担起制度供给机制的前置功能。自2015年设立以来,天津自贸试验区已实施600余项制度创新举措,其中如“一制三化”、智慧监管、绿色港口制度、保税维修制度等,被全国复制推广。制度创新的方向集中在两类:一类是内部制度环境优化,如企业登记便利化、金融监管沙盒、跨境电商政策集成;另一类是规则与标准输出路径探索,如航运保险制度、融资租赁规制、多式联运“一单制”。制度供给已由流程简化迈向规则主导,体现出从治理优化走向制度构建的跃升。

其次,“鲁班工坊”是天津推动教育制度国际传播的实践平台,具有典型的制度输出结构。“鲁班工坊”体系包含四个层级的制度设计:一是标准化课程体系,统一教学内容与评价标准;二是模块化教学资源,适配不同国别实际;三是本地化师资认证机制,形成在地运营的可持续性;四是多元协同治理结构,整合政府、高校、企业与国际合作方资源。这种制度性组合不仅提升了教育援外的质量,也体现了中国制度逻辑在知识治理层面的有效嵌入。最后,京津冀协同发展制度化进程体现为区域制度一体化

架构的逐步构建。天津在推动区域协同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以“制度兼容性”为核心的协调机制,包括市场准入标准统一、营商环境对接、信用信息互认、监管互认等。例如,空客总装线项目背后的制度支撑体系涉及税收优惠、审批流程、要素配置等制度协同,为跨区域重大产业协作提供了基础制度保障。

三、制度型开放与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深层互动机制

制度型开放不仅着眼于外部资源配置,也与城市内部治理结构深度嵌合。从城市治理视角出发,制度型开放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推动治理结构的系统重构。

第一,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数据驱动—标准牵引—流程再造”的治理逻辑。在智慧城市治理中,天津依托“城市大脑”与“津治通”平台构建起以数据标准为引领、跨部门数据共享为基础的制度流程体系。其治理创新价值不在于技术工具本身,而在于以制度标准嵌入治理流程,实现“标准即治理”的范式转型。

第二,制度型开放推动了“常态—应急”治理机制的系统融合。以“平急两用”基础设施建设为切入点,天津逐步建立起多部门联动的应急物资保障制度、网格化社会动员制度和风险监测预警机制。

第三,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党员教育培训的“三维聚力”新实践

杨莲霞 李 蔓

党员教育培训是党的建设基础性、战略性工程。其质量和成效直接关系到党的政治凝聚力和组织活力,影响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决定着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水平。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全国党员教育培训工作规划(2024—2028年)》,为新时期党员教育培训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强化政治引领,筑牢思想根基之“魂”

深化理论武装,增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自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特征之一是重视理论武装。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是党员教育的首要政治任务。必须构建“学习—研究—运用”一体化的理论教育体系,推动理论学习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建立以政治理论为核心的长效学习机制,系统开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研学,实施“原著精读计划”,通过集体诵读与深度思辨相结合的方式系统学党的创新理论。构建理论学习“双重评价”体系,将知识测评与理论转化能力考核有机结合,实现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的质性跃升,避免理论学习中的形式主义倾向。

提升政治能力,强化党员干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本领。党员干部作为政治组织中的关键力量,其政治能力是党的组织力向领导力转化的重要节点。新时代党员干部教育必须突出政治能力这一核心素养,坚持实践导向,将抽象的政治理论内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素质。遵循政治能力建设的规律,在日常培训中强化政治判断力的历史思维与辩证思维培养,将政治领悟力融入对重大决策部署的深入解读,以政治执行力考核作为党员干部政治能力的实践检验。新时代党员教育要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推动理念创新与方法革新,构建全周期培养链条,系统提升党员政治素养,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组织根基。

二、精准分类施策,夯实本领提升之“基”

细化分类指导,提升教育培训的精准性实效性。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拥有9900多万党员的世界最大政党,党员队伍呈现出多元化特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必须尊重差异、分类施策,才能提高教育实效。要依据党员的职能定位、发展阶段与知识结构,构建差异化培训体系:一是对领导干部,聚焦战略思维与决策能力培训,侧重宏观政策分析与复杂问题研判;二是对基层党员,强化政策执行力与群众工作能力,突出实践教学;三是对青年党员,注重理想信念教育与创新思维培养,运用适合其认知特点的教学方法;四是针对特殊群体党员,采取“送教上门”与“云端课堂”相结合的方式,保障教育全覆盖。此外,区域性党员教育还应结合地方发展战略,形成特色培养路径,使党员教育与区域发展战略同频共振。

丰富教学方式,增强教育培训的吸引力感染力。党员教育方法论的核心在于知行合一。“道不可坐论,理不能空谈”,党员教育必须突破理论与实践二元对立的思维局限,构建以践行为导向的教学体系。要强化案例教学法在党员培训中的基础性地位,精选典型案例作为理论与实践的中介,引导党员在案例剖析中提升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将红色资源转化为党员教育的生动教材,通过情境式、沉浸式学习,实现从历史维度对党的初心使命的深刻理解。建立党员培训需求反馈机制,使培训内容更加贴合实际,避免“供给侧”与“需求侧”的错位。

三、数字赋能增效,实现效能提升之“翼”

数字赋能,打造智慧化教育新模式。信息技术与党员教育的深度融合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构建“技术+内容+应用”一体化平台,是实现党员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应充分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建立线上线下协同互补的教育格局,打破时空限制,提高教育可及性。通过建立“党员政治素养数字画像”,精准分析学习行为特征,实现培训资源的精确推送。系统整合共产党员网、学习强国等优质平台资源,构建全场景化学习环境,实现教育的连续性、系统性和适应性,有效应对党员学习中的碎片化、表层化倾向。

筑牢防线,加强平台信息安全管理。数字时代的党员教育培训必须高度重视网络安全问题,这是维护党的政治安全的应有之义。党员网络行为必须遵循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成为网络空间秩序的维护者。要构建“三位一体”防护体系:一是责任落实制度化,严格执行《党委(党组)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厘清安全责任边界;二是防护标准规范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对党员教育平台实施分级保护;三是监督机制智能化,建立全过程可追溯的学习管理系统,运用算法技术实时监测风险点。同时加强网络安全意识教育,引导党员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提升防范能力。

推动新时代党员教育培训高质量发展,必须强化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要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党员教育培训工作规划(2024—2028年)》的部署要求,构建“理论武装、实践锻炼、数字赋能”三维协同的发展格局,推动党员教育从形式覆盖走向实质引领。着力培养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先锋队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和组织支撑,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贡献智慧和力量。

【作者分别为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理工大学基地研究员、天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天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本文为“天津市思政课常设课题(‘纲要’课)”重点课题“中共党史党建学视阈下党的建设融入思政课教学研究”阶段性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表达了对社会主义文艺工作的殷切期盼,并在天津视察时提出要在推动文化传承发展上善作善成,给出“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的重要指示,为天津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法路径,注入了强劲动能。大量经验证实,科技含量的多寡决定了文化产业的兴衰,因此,打造“数字+文艺产业”的有机融合机制是天津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一方面能够以此深刻变革文化产业面貌,提升文艺生产力的效率与质量;另一方面能够催生出新型文化业态与商业模式,拓宽文化传播与消费场景,成为我市经济新的增长点。

一、继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文艺产业数字化升级

文化产业的数字化升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继承发展的重要途径。天津的文艺产业蔚为大观,相声、评书、京剧、天津时调、梅花大鼓等堪称津门绝技,彩塑、年画、风筝、剪纸、花丝镶嵌等非遗匠心独运,五大道、意式风情街等建筑中西合璧,津派文化呈现兼容并蓄、多元融合、百家争鸣、百舸争流的繁盛面貌。利用数字技术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创新,既可以保留传统之厚重,又能够焕发现代之活力。首先,让数字技术成为传统文化的“保护者”。可以利用高清摄影、三维立体扫描、音频录制等技术对天津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存储及系统化整理,形成数据库,以规避非遗传承人减少、记录方式有限的风险。其次,让数字技术成为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可以通

以制度型开放新优势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

陈怡宇 王保彦

技术的逐步构建。天津在推动区域协同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以“制度兼容性”为核心的协调机制,包括市场准入标准统一、营商环境对接、信用信息互认、监管互认等。例如,空客总装线项目背后的制度支撑体系涉及税收优惠、审批流程、要素配置等制度协同,为跨区域重大产业协作提供了基础制度保障。

三、制度型开放与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深层互动机制

制度型开放不仅着眼于外部资源配置,也与城市内部治理结构深度嵌合。从城市治理视角出发,制度型开放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推动治理结构的系统重构。

第一,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数据驱动—标准牵引—流程再造”的治理逻辑。在智慧城市治理中,天津依托“城市大脑”与“津治通”平台构建起以数据标准为引领、跨部门数据共享为基础的制度流程体系。其治理创新价值不在于技术工具本身,而在于以制度标准嵌入治理流程,实现“标准即治理”的范式转型。

第二,制度型开放推动了“常态—应急”治理机制的系统融合。以“平急两用”基础设施建设为切入点,天津逐步建立起多部门联动的应急物资保障制度、网格化社会动员制度和风险监测预警机制。

第三,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四,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五,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六,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七,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八,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九,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十,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十一,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十二,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十三,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十四,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十五,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十六,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十七,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十八,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十九,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二十,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二十一,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二十二,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二十三,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二十四,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二十五,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二十六,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二十七,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二十八,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二十九,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三十,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三十一,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三十二,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三十三,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三十四,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三十五,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三十六,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三十七,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三十八,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三十九,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四十,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四十一,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四十二,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四十三,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四十四,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四十五,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四十六,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四十七,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四十八,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四十九,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五十,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五十一,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五十二,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五十三,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五十四,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五十五,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五十六,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五十七,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五十八,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五十九,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六十,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六十一,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六十二,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六十三,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六十四,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六十五,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六十六,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六十七,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六十八,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六十九,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恢复与制度规范、周邓纪念馆的制度化运营机制,均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支撑逻辑。

第七十,制度型开放强化了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转型路径。天津非遗项目、历史街区保护、红色文化场域的制度化利用,不仅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制度激活机制,也体现了制度在价值传播与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如“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性保护制度、“五大道”街区的风貌